



琅琊台：琅琊文化的圣地

壹 祭春礼日的圣地

“琅琊台”一名，史籍最早载于《山海经·海内东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史记索隐》释为：“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

西周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之后，在山东半岛作八神，其中四时主祠立在琅琊山上。《史记·封禅书》有“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的记载。此后，琅琊台成为我国东部沿海祭神求仙活动的中心，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国内所存最早的古观象台。

春秋时期，齐置琅琊邑，治所在琅琊台西北五公里处的琅琊城，即今天的夏河城。齐桓公与齐景公曾到此巡游。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籍记载，越王勾践灭吴后，为北上称霸中原，遂从会稽迁都琅琊，在琅琊山起观台，以望东海。所筑之台便成了琅琊台的起始和雏形。

秦统一六国后（前221年），设三十六郡，琅琊为其一。秦始皇曾五次巡游天下，三次登临琅琊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东巡，到琅琊台后，遂迁三万户百姓于台下，重筑琅琊台，并在台上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礼祠四时主，于台下修御路三条，还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次年（前218年），秦始皇由之罘至琅琊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再登琅琊台，并亲自护送徐福出海，后在回咸阳途中病死在沙丘平台。二世即位后，于前209年东行郡县至琅琊，登台刻诏书于始皇所立刻石旁，彰显始皇帝功德。

西汉时，武帝效法秦始皇，好封禅，祀神求仙，曾九次巡游天下，四次登临琅琊台。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八神之一的四时主的祭祀地就在琅琊台。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南巡，从海上北至琅琊。太始三年（前94年）春，武帝巡视东海，又“幸琅琊”。太始四年（前93年）再至琅琊，祠神人于交门宫。此后汉宣帝、汉明帝等帝王也曾登临琅琊台，举行祭祀活动。

琅琊台壮美的海天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历代文人名士前来探古寻幽。唐朝开元进士熊曜，曾登顶琅琊台，目睹太阳从海底升起，被其景象的磅礴

磅礴壮丽所折服，遂作《登琅琊台观日赋》：“秦东之门，天地一空。直见晓日，生于海中。赤光射浪，如沸如铄。惊涛连山，前拒后却。圆规上下，隐见寥廓。焜煌天垂，若吞巨壑……”逼真地描绘了琅琊日出的震撼景象。清乾隆《诸城县志》说：“观海则琅琊台独居其胜，应助《封禅仪记》谓泰山日观峰鸡一鸣时见日，今台上四更后见日，‘眩转心目，苍黄性情’，真如曜所赋矣。”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文学家、知密州军州事苏轼，登上琅琊台，留下了《书琅琊篆后》，赞颂秦琅琊刻石“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明神宗万历年间，诸城县知县颜悦道在琅琊台上建海神庙、礼日亭。后之登游者，陆续立龙头碑七十余座。

如今琅琊台古建筑虽已荡然无存，但自然景观令人叫绝，筑台遗迹尚依稀可辨。从整体上看，依然可见整个高台分三个层次，递阶而上，有明显的层台形状。筑台的夯土层清晰可辨，大部分保持完整。据考，台上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砖瓦碎片，留存有较完整的秦砖汉瓦，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代琅琊刻石堪称国宝，出土的秦代“千秋万岁”瓦当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82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布琅琊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将其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琅琊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A级旅游区；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9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全面启动琅琊台遗址考古工作，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复计划，对琅琊台大台夯土遗迹进行发掘。在台顶东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的三排陶制管道，大小管口紧紧相扣，每一节管道长度约60厘米，阔口直径约45厘米，壁厚达7厘米以上，从体量到质量都彰显出古人非凡的智慧。在台顶西侧的考古探坑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千秋万岁”瓦当，以及秦汉时期的石砌地漏，地漏两端连接陶制管道，管道设有滤水池，有陶制“三通”构件，是一套完备的盥洗排水设施。在陶制管道设施的周围发现了柱础、空心砖台阶和灰质岩台阶踏步等建筑遗存。琅琊台是秦皇汉武多次巡游的地方，这里应该是一处与皇帝活动直接相关的皇家建筑。2021年4月，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本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发现。

贰 中国古代的观象台

《尚书·尧典》记载，四时祠起源于尧帝。尧帝为了建立更合理的天文历法，在总结颛顼旧历法的基础上修订推演了新历法。为了验证新历法的准确性和保障实施，尧帝委派了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官员分值东、南、西、北四方，验证四时节气。四位祠官的封地和住所就是古代四时祠的处所。在东方嵎夷旸谷观测气象的羲仲担负着观测物候、气候、人候，推演、验证春天气气，祭祀春祠的大任。在《史记·封禅书》中有“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的记载，无论在方位还是在显示的节气次序上推断，羲仲祭祀春祠的“嵎夷旸谷”应当是在琅琊，琅琊台是羲仲殷正仲春的具体地点。后来，由于朝代更替，历法兴废，分散四方的四时祠逐渐荒废。到了西周初，姜太公将分散各方的夏秋冬三祠集中于琅琊台与春祠一并祭祀，创立了全新的四时主祠。四时主祠是当时国家设立的天文机构，不单有祭祀功能，还承担着观测天象、物候气候，分时计岁，授民以时的天文功能，因此琅琊台成为我国古代的观象台。

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在琅琊山立观台。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琊，立观台以望东海。”《辞源》对“观台”的解释是“瞭望天象之台”。薄树人主编的《中国天文学史》中说，古代观象台，夏代称清台，商代称神台，周代称灵台，诸侯称观台。因此可以说，越王勾践在琅琊山立的观台是一座观象台。

越王勾践为什么要在琅琊山立观台呢？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都非常重视观测天象，甚至还立下观测制度。勾践“立观台以望东海”，就是在台上观测东海上的云气。变幻无穷的云气是天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不惜重墨，用800多字写观测云气，特别详细地阐述了望云气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因为望云气与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关系，处在时代激流中以军事力量雪耻复国行霸的越王勾践，必然会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注意观测东海云气以备采取重要行动。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古代的天文台，无论天子的灵台，还是诸侯的观台，“皆在国之东南二十五里。东南少阳，用事万物著见。用二十五里者，日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古代的天文台都有神泉。《水经注》记载琅琊台“山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琅琊台，在城东南十里……台上有神渊”。经实地考察，这段记载和今琅琊台的情况一致。与古制对照，虽然越王勾践立的观台在越国徙都东南不到二十五里，只有十里，但古制“用二十五里”是为了能“朝行暮反”，十里路程更便于早出晚归。越王勾践观台上的神渊就是神泉，此泉犹在，水清如碧，常年不涸。所以说，越王勾践在琅琊山立的观台，是一座完全符合古制的观象台。

秦始皇修筑的琅琊台也是观象台。公元前219年，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东巡郡县。此次巡游一个重要的动因，就

是《史记·封禅书》所说“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说明秦始皇是按照登上天文台的礼制行事的。通读《秦始皇本纪》，司马迁写了秦始皇的一生，只有写到他“登琅琊”时才用一个“乐”字，而且是“大乐”。这不是说始皇帝一生只“乐”过一次，而是说这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乐”。秦始皇“登琅琊”的“大乐”，是他第一次踏上这座观象台的庆典，是以游乐为主要内容的政务场面，也是他向季节之神行的大礼。秦始皇在“留三月”期间，还用大量的时间“观日”。苏轼在《书琅琊篆后》中写秦始皇“登琅琊台，观日出，乐之忘归”。在古人的文化观念中，认为日有人君之象，就连日旁的云气，人们也赋予它主人君英明还是有瑕的丰富内容，所以秦始皇必然重视观日。

秦始皇对四时主推崇至极。他在琅琊刻石上赫然铭刻：“应时动事，是维皇帝。”琅琊刻石上还有“节事以时，诸产繁殖”的刻辞，阐明只有按照四时变化，不失时机地做好应做的各种事情，天下才会繁荣，百姓才会富足。秦始皇组织大规模工程建设，在越王勾践立观台的琅琊山重筑一座更加壮观的观象台。《水经注》记述琅琊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考察现在的琅琊台，可以看出当年是从琅琊山北、东、南三面夯土筑上山顶的。仔细观察夯土的剖面，夯筑痕迹清晰可见，有建筑物和大量陶片暴露。经专家鉴定，夯土中的陶片都是秦和秦以前的遗物。从考古情况可以看出，现在的琅琊台就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修筑的琅琊台，其面貌与郦道元所记的古琅琊台基本相符。

琅琊台顶出土不少瓦当、地砖、装饰砖和陶制管道，应是始皇帝重修四时主祠的建筑材料。台顶出土文物向今人展示着一种大建筑的气派。“千秋万岁”瓦当上四个字气度开阔，结构严谨而又舒展，装饰简洁庄重，体现了秦始皇“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宏愿。在四时主祠装饰“千秋万岁”瓦当，表明他将皇帝基业的承继与遵从四时联系在一起，是对“不知四时，乃失国基”思想的宣扬。在琅琊台下东海边，还建有一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台，与琅琊台遥相呼应，那是祭祀四时主的祭台。

综上，秦始皇修筑的琅琊台，是建有宏大的四时主祠，以观日、望云气、观四时施化和祭祀四时主为主要功能的美轮美奂的观象台。迄今我国已发现的古观象台遗址有6处，其中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在地下；地面上的几座，最古的是汉代的。因此，可以说琅琊台是迄今已知的地面上遗址尚存的我国最早的观象台遗址。

（节选自《青岛西海岸历史文化概览》）